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中的身份政治： 内涵、运行逻辑与互动困境

姚璐 邢亚杰

【摘要】身份政治是一种群体认同模式,是主体通过价值观、意识形态、情感等建构群体认同,以群体的形式实现特定目标与诉求的政治实践。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存在不同的逻辑起点与逻辑前提,不同于人基于自我实现与争取主体位置发动的身份政治,国家间的身份政治兼具差异属性与工具属性,是权力政治的一种补充,常成为国家为维护利益与权力优势的工具。它遵循着“认知—认同—互动”的脉络,在分类划界的基础上,以动机推动认同建构,进而调动认同融合以作用于国家间的互动。在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的现实背景下,身份政治发挥着消极作用,诱发着国家间的互动困境,国家间的互动逐渐显现出群体区分、群际对立冲突频发的图景。

【关键词】国际政治理论;身份政治;国家;无政府状态;国家间互动

【作者简介】姚璐,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邢亚杰,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原文出处】《国际政治研究》(京),2022.3.92~118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构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问题及路径研究”(项目号:17CZZ03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地缘战略研究”(项目号:16JZD027)的阶段性成果。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①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流行之势。不同于20世纪60-70年代追寻叙事表达权力的“文化政治”,现今的身份政治已经成为具备政治动员意义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BLM)运动到“我也是”(ME TOO)运动,各地大规模的运动都回归到身份政治,^②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基于认同进行着群体划分,其诱发的“政治正确”“政治极化”威胁着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稳定。作为一种因身份认同的差异性解释而产生的现代群体性政治观念以及行动,^③身份政治产生着外溢效应,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与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政治污名化,都渗透着身份政治的影子。同样,在大国博弈的过程中,无论是为维护国家内部稳定还是维护国家权力优势,树立共同敌人、建构调动群体认同成为国家常用手

段,身份政治使国际关系的紧张与不确定性不断加剧。可以看到,从国内政治到国际政治,身份政治均发挥着影响力,那么,不同层次的身份政治是否遵循着一致的作用过程呢?

在既有研究中,国内层次的身份政治成为研究重点。身份政治涉及社会学与政治学两大领域,是身份与政治的复杂结合,这种起源影响着学界对身份政治的研究偏好。在研究范式上,身份政治实现着社会定义范式与社会行为范式的融合,学者们关注个体产生群体认同的动机与以激进表达、政治对抗为主的政治行为,回归选举投票、社区运行、宗教冲突等具体场景,对身份政治进行经验、实证分析。^④在研究对象上,身份政治关注残疾人、妇女、同性恋、黑人等社会边缘群体,聚焦少数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间的互动博弈。研究对象的窄化带来研究层

次的固化,学者们多从国内层次出发,探讨身份政治与民粹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关联,侧重于身份政治对国内政治稳定的影响。^⑤在国际关系领域,少数学者业已关注到身份政治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整体呈现两种研究思路:一是关注国内层次身份政治的外溢作用,如区域多民族与多宗教带来认同困境,制约着区域整合;^⑥跨境民族的族群身份认同影响着国家周边外交政策。二是以国家为主体,探究国家间身份政治出现的条件与影响,如国家间的权力平衡、共同利益扩大、彼此间的“异质身份”是其产生与发展的条件;^⑦而身份政治也影响着美、日、韩、澳这些国家的盟友选择与对外交往。^⑧

可以发现,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中,身份政治有着明显的主体差异,同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政治环境也有着本质不同,这些不同孕育着身份政治在不同层次的出现条件与影响。然而,在现有研究中,针对不同层次的身份政治的比较分析是缺乏的,这就导致身份政治内涵存在着模糊与泛化,对这一元概念认识的不足致使其解释力受限。而相较于国内层次的研究,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研究更显单薄,更多是将身份政治作为一个视角来阐释国际关系,简单地将身份政理解为意识形态、价值及文明的对抗或冲突,忽视了对身份政治逻辑链条的探索,这也是身份政治的体现之一——“文明冲突论”会招致批判的重要原因。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变迁、后真相时代的发展及国际体系中权力优势的变动,国际关系中的身份政治仍会深化存续,持续影响国家间互动。在此背景之下,全面认识理解以国家为主体的身份政治成为关键。

本文遵循定性研究路径,围绕不同的逻辑主体、逻辑条件对身份政治这一元概念进行跨层次分析,提出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与国内层次的身份政治的根本不同。在此基础上,对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进行过程性分析,探究其作用逻辑与作用效果,以此推进国际关系中身份政治的理论化研究。

一、身份政治的跨层次分析

身份政治是特定主体通过确定身份,建构具有归属意义的认同,并以结成群体的形式实现特定目标与诉求的政治实践。在确定身份、建构认同的过

程中,主体对自身及与他者关系的认知与描述是核心内容,从“我是谁”“我在哪”到“我们是谁”“我们在哪”,这个过程蕴含着身份政治的演化方向——从个体向群体的转变。身份政治有着一定的通约性,这使得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存在两大共同点。

第一,二者同属群体认同模式,这是由认同的独特内涵决定的。认同普遍体现个体与他者的共同、区别之处,^⑨个体衡量彼此间的相似或相异,与之产生“我们感”,进而结成群体,^⑩对个体而言,成为群体成员不仅可以获得安全和保护,还可以带来群体内的声望、认可与地位。^⑪回到身份政治,在各种政治、经济或其他社会实体试图将基于民族、种族、语言或地点等集体认同塑造成相对固定的、自然的“自上而下”的理解框架时,^⑫往往呈现出这一图景:以个体结成的群体进行政治实践,以群体形式进行利益的表达、寻求与维持。第二,两者同属差异政治,^⑬这是由认同的过程性决定的。认同是建立在分化、差异甚至对立基础上的选择过程,^⑭在这个过程中,分化、差异成为个体确定身份、划分边界、建立同一性的起始点。认同所展示的“同一性”事实上是在权力和排斥的游戏内建构的,不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或基本的总体性构成,而是一种被加以自然化的、过度决定的“封闭”过程。也就是说,这种差异其实是在区分与排斥的逻辑上形成的。^⑮

然而,虽同属群体认同模式与差异政治,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在群体认同模式上,国内层次的身份政治表现为“自下而上”的政治抗争与政治运动;而在国际层次,通常表现为权力优势国家主导的对异质国家的合围。就差异政治而言,在国内层次,身份政治以差异原则消解同一性哲学当中对差异的支配和压迫,要求差异的合法化和正当化,^⑯诸如“为了种族和经济公平”(For Racial and Economical Justice)、“我们都是女性主义者”(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停止仇视亚裔”(Stop Asian Hate)等口号中无不传递着正视、尊重差异的讯息。在国际层次,身份政治以挤压、控制甚至消除差异为手段,维护着自身的主体位置与利益。尤其在那些拥有消除观念差异、崇尚单一文化的偏

好的西方国家,^⑩常以差异来明确边界,建构群体认同,从而形成同质群体,与“他群”产生对立、冲突。

如若仅从身份政治的一些共性内涵来考察,很容易出现学理上的机械僵化,致使身份政治成为剖析政治生活的万金油,这是现今身份政治研究泛化的原因之一。在笼统的共性内涵下,之所以出现上述显著区分,根源在于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身份政治的逻辑起点与逻辑条件的不同。

(一)人、国家两主体带来不同的逻辑起点

就主体而言,无论是认同还是政治,都强调主体的核心性,^⑪而受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浸染的身份政治关注到了主体位置。关于主体与主体位置,存在一个解读误区,有学者认为,身份政治就是主体位置之争,主体位置替代主体成为身份政治的核心。笔者并不认可这种看法,主体与主体位置不可分割,正因为主体的差异,才衍生出身份政治研究层面的差异。具体而言,在国内层次,人是身份政治的主体。从历史维度看,以人为主体的身份政治早已在古代时期便自筑藩篱,无论是阿卡狄亚族群认同多样性带来的多样性政体,^⑫还是秦汉陇右地区的华夏与羌、胡、氐等族群的冲突,身份政治均以人的血缘、信仰为纽带建构政治认同。从认知维度看,在人认识自我的过程中,自我本身具备主观性、自由性和理性,^⑬自我实现是一个由个体、特殊自我走向普遍自我的过程,这个过程依托同化对象、获得对象的承认而实现。因此,身份政治本身就是人进行自我实现的过程。

身份政治与自我实现有关,也与个人在社会角色中的分配有关,带有识别标签。^⑭在现实维度中,阶级政治固化着个人在社会角色中的分配,依循契约原则带来的政治同质化公民身份遭到破坏。在强权—资本场里,有的人处于主流位置,享受着优渥资源与真正意义上的权利;有的人处于边缘位置,遭受不公、挤压与排斥。这些人往往有着明显的标签。比如,特定的肤色、性别、性取向、语言、信仰等,基于这些可识别的标签明确边界,建构着认同,形成各自的群体。其中,少数边缘群体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身份政治的发动者,其拒绝将阶级作为组织原则,将身份政治视为纠正生活机会偏差的策略。^⑮

而进入21世纪后,主流群体成为身份政治的又一发动者,他们支持反经济全球化、反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将身份政治视为表达不满、获取利益的标杆。这种群体的转变造成了身份政治从政治光谱的左侧走向右侧。

上文提到,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呈现两个研究思路:国内身份政治产生外溢效应影响国家与区域族群关系的建构,以及以国家为主体探究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其中,在国内身份政治的外溢效应中,依然是以人为主体的,本文对此不做过多探讨。^⑯聚焦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循此分析国家之间的身份政治是本文的一个写作重点。在身份政治中,国家能够成为主体是研究者们将其拟人化的结果,这就要回到亚历山大·温特关于“国家也是人”的论述,在温特看来,国家不仅具备团体意图性,也具备集体意识,是一个超级有机体,^⑰这样的团体人以个体形式存在于国际社会,而国家之间的关系遵循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这也是身份政治在国际层次与国内层次存在共性的又一原因。但国际社会的社会人国家与国内社会的个人仍然有着显著区分。

从起源上看,国家是个人权利让渡的结果,是基于契约结成的政治共同体,这使得个体对共同体的要求与利益有着更强的自觉,“我群”与“他群”的界限更为明晰甚至被绝对化,^⑱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对差异的认知也会被放大,不可避免地具有排他性。这意味着,国家这一客观存在与身份政治是相互伴随、相互塑造的关系。从目的上看,国家参加国际社会的目的是希望以此获得他国对自己独立地位的承认,特别是获得它们对自己所辖民众和领土享有最高统治权的承认,^⑲这和国内少数边缘群体为谋求承认主动发起政治运动不同,由于权力的限制,没有获得完全承认与尊重的非中心位置的国家是被动的。当面临异质国家组成群体就独立与领土完整对其进行围攻性的质疑、指责甚至攻击时,此种国家很难有能力主动发起类似国内的群体运动。可以看到,谋求承认能够成为人结成从群体发起政治抗争的直接动力,但这种直接动力并不适用于国家。那么,是什么促使着国家发起身份政治?

回归到国家间的交往过程,国家遵守着“国家利

益至上”原则,国家在形成之时就有着给定的部分利益(如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利益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相较于个人对利益的重视,国家对于国家利益的重视是被强化的,强化的结果是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为手段化,成为一种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所谓“信赖”“亲密关系”“友谊”等都只是一种对获得利益更为有利的状态描述。^②从这个角度出发,身份政治其实是国家获取、维持国家利益的手段。而当以“我群”与“他群”的视角对待国家间利益冲突时,经过文明或意识形态透镜折射后,该利益冲突可以放大很多倍。^③国家对利益的追寻驱动着身份政治的发生,身份政治也放大了利益对国家的重要性。另外,国家在国际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也起着决定作用。中心、边缘的位置分布是权力在结构中的体现,^④权力强国位于中心位置,弱国则位于边缘位置。在面临权力变动带来的位移时,为了维护自身位置,一些国家会利用某一身份或某种认同应对其他国家的“上位”冲击,尤其当受传统权力观影响深远的中心位置国家面临权力优势丧失时,经常建构相似国家间的群体认同以实现包围压制“上位”国的目标。例如,面对中国崛起,拜登政府以价值观为载体,打造“反华俱乐部”,价值观同盟的建立并非仅仅是价值观相似的结果,更深层的原因是需要共同弱化甚至消解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价值观认同无疑成为笼络日本、澳大利亚等非中心国家的利器。由此可见,不同于弱势边缘群体寻求承认与公平,根植于权力的客观差异,以国家为主体的身份政治并不是处于边缘的国家寻求承认或成为中心的产物,而是一些国家为了维护自身位置所使用的工具。

(二)不同的逻辑条件:有政府与无政府

是否存在政府这一逻辑条件塑造着不同层次身份政治。就国内层次而言,政府是国内共同权威体现,它的合法性来自民众的意愿,尊重并实现不同群体的意愿成为政府维持稳定的途径。由不同群体发起的身份政治便成为统一政治框架下的分散化、碎片化的政治实践。在分散化、碎片化的政治实践中,特定群体意愿的理智表达是群体间、群体与政府间有效沟通的关键,这是身份政治积极作用的发挥。然而,由于非理性激情缩小了个体的认知范围,个体

自我控制能力与理智分析能力减弱,个体对后真相时代充斥的虚假信息辨认能力下降,与“他者”之间的差异也更加绝对化、极端化,以此为基的身份政治有着消极性。同时,政府是强调维持秩序的机构和法律的存在,其具备强制力和规制力,在不同群体表达政治诉求、进行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政府发挥着约束与调节的作用,这使得身份政治具备一定的可控性。但这种可控性是否意味着完全可控?答案是否定的。身份政治可控性建立在政府态度与能力的统一中,负责任、能力强的政府可以修补群体与群体间、群体与政府间的裂痕;而无为政府却起着反向作用,会进一步激化民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多的民众依据自身标签确定群体身份,而群体身份的固化会进一步强化群体认同,身份政治的深度与广度被拓展,易成为一场对政府、对国家的反叛运动。正如一些学者所言,社会运动或政治化的认同被认为是比统治政权及其国家机器更能满足民众基本物质需求的替代方案,^⑤在一定意义上,身份政治是反政府、反国家的政治抗争。

而在国际层次,无政府状态成为核心背景条件。根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的定义,无政府状态有两层含义,一是缺乏秩序,是一种政治混乱状态;二是缺乏政府,即缺乏共同的中央权威与统一的政府制度。在国内政治中,权力斗争受到法律和制度框架的支配和制约,而在国际政治中,法律和制度受到权力斗争的支配和制约。^⑥按照此界定,秩序缺乏带来频发的冲突与战争,国家的敌友观因此鲜明,围绕共同敌人之间达成群体合作成为国家间身份政治的出发点,无休止的战争与冲突也会使得群际敌友身份固化。而共同的中央权威与统一的政府制度的缺乏意味着强制力与约束力欠缺,尤其是缺乏对武力的集中控制与约束,这极大增加了互为敌手的国家之间长期存在难以解决的意识形态冲突和不受控制的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国家间的身份政治会有着更强的烈度与破坏力。

然而,在国家关系现实运转中,等级制的存在似乎成为验证无政府状态真实性的关键。有学者将等级制视为对无政府状态的破坏,认为理想的无政府

状态不会显示明确的等级,因为等级制通过惩罚、干预两种机制产生着秩序。^②出现这种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上,无政府状态虽然不存在世界政府这一公共权威,但每一个主权实体有着不同的实力与影响力,形成着“有序的无政府状态”。因此,国家物质能力的分布及强大参与者的行为对无政府状态有着重要决定作用,具体而言,霸权的实施方式对无政府状态或等级制度的存在非常重要。^③在无政府状态下的权力斗争中,国家凭借占据绝对优势的成为霸权国,霸权国借助公共产品供给建立了其他国家放弃一定程度主权的权威关系,借助制度创设建立了其他国家让渡一定程度主权的契约关系,形成所谓的等级制。在这样的等级制中,拥有压倒性实力优势的霸权国占据中心位置,对其来讲,权力转移的出现意味着原有权力优势与制度优势的双重下滑甚至丧失,其本体安全也会受到威胁。面对这种情况,霸权国会调动内群体认同融合,与附庸集团展现空前一致的敌意与群体性的合围压制,以应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身份政治其实是权力政治的一种补充,成为寻求或维持权力的工具,本质上分散的国家通过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相似性建立认同,建构同质化的群体。

二、国际层次身份政治的运行逻辑

明确运行逻辑是挖掘身份政治过程性的关键。在国内层次,身份政治经历着建立内部意识体系、再外化为外部行为表现与行动的过程,具体体现为位置识别、明确动机、建构认同和诉诸行动这些步骤。在这一过程中,特定的人遭受到不公或不利对待,在共同利益与共同目标的指引下,建构认同并结成群体,在群体抗争运动的刺激下进一步强化内群体认同,以求回到应有或原有的位置。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兼具差异属性与工具属性,其运行逻辑遵循类似机理,国家从认知走向认同再诉诸行动,但其有独特的运行逻辑。具体而言,可以分为分类阶段进行边界确定,动机阶段进行认同建构,认同融合阶段进行互动选择三个阶段。

(一)确定边界:依据国家特性与话语表达进行的分类

在身份政治中,“我群”与“他群”的确立关键在

于群体边界的确定,分类是确定边界的基础。社会认同理论的基本前提便是:内群体—外群体区别产生于社会分类过程。^④受社会认同理论影响,国家之间也存在相应的分类逻辑。例如,依据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将国家分为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标准,将国家分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和现代的民族国家,以政治治理形式为标准,有集权主义国家和分权主义国家之分。依据国家特性(意识形态、情感、偏好、实力强弱及利益需求等)而产生的国家类型成为国家产生他者判断的基础,也成为国家间产生群体划分与群际差异的起点。在确定为某种国家类型的过程中,国家获得了在权力、意识形态和地位上彼此相关的社会类别中的某种群体特征,其成为一国与其他国家比较异同的参照。比如,某国是发达国家,由于发达国家这一类型,该国与其他同质性的国家就有了群体连接,而与另一发展中国家也有了实质区分。此外,分类主体越是认同某个类别,就越愿意在他们的自我定义中使用该类别。当谈到国家的意识形态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根本上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这种区分伴随着彼此声称而变得愈加明显。在“各说各好”的环境下,对意识形态划分类别的坚持与强调加剧了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可以看到,持不同意识形态的美国与苏联很难达成同一性,彼此认为是敌人,并以意识形态为抓手确立着相应的阵营,最终呈现两大群体之间的冷战。

在依据国家特性进行分类的基础上,话语也发挥着明确分类功能。在国家特性的基础区分下,国家获得标签,不同标签背后有着不同的话语表达逻辑。诸如美国称苏联为“红色殖民主义”、称古巴为“流氓国家”这些富有差异敌意色彩的话语,不仅传递着美国与苏联、古巴的本质不同,也具备着一定的吸引力与煽动性,一定程度上使得国家之间分类显性化。同时,在实践层面,话语以叙事(Narrative)的形式发挥着工具属性。行动者(无论是个体还是共同体)的认同必须经由叙事得到塑造,^⑤但叙事深层结构秉持的是二元对立原则,好与坏、善与恶、强与弱、冷与热这些叙事范畴使叙事产生意义,^⑥在国家叙事

体系中,安全叙事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如苏联的“战后人民的水深火热,资本主义是大萧条、战争、大屠杀的罪魁祸首”、特朗普的“新冠疫情比‘珍珠港事件’或‘9·11’事件更严重”,这些叙事背后均显示出一种将差异升级和具体化为他者与威胁的强烈倾向。由此可见,二元对立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差异政治,更是差异转化而成的不安全感,^④这种不安全使得国家区分异质者,寻找和自己相似的对象,与这些同质国家结成群体,以实现对自身安全的维护。

面对复杂的国际社会环境,国家通过分类简化了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过程,节约了认知资源,^⑤获得了高效的认知机制。然而,这种简化过程也影响了群际关系的基础、扩大了群际差异性和群内相似性。^⑥这是因为,同类国家间更容易产生同一性,组成一个群体,而将自己归类为内群体成员也需要将自身与内群体类别进行同化,并增强与其他组内成员的相似性。^⑦在分类阶段中,国家基于差异进行区分,奠定了彼此间认同产生的基础。然而,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认知固化。根据自我分类理论(SCT),分类会导致类别内的相似性与类别间差异性的增强,一层分类的凸显会降低或抑制各个层面的感知相似性与差异性,这也是为什么冷战时期各个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差别迅速加入了两大阵营,而忽视了彼此间其他相似性。

(二)建构认同:依据共同命运与最佳区分明确动机

分类确定了群体之间的边界,而国家间的动机建构了群体认同。在群体认同理论中,诸如社会比较理论、自我分类理论都未将动机纳入解释范畴,实际上,动机是解释个体情感与行为的重要视角,个体动机的形成,是其对某一群体产生并增强认同的关键阶段。国家间的共同命运与最佳区分明确了建构认同的动机。^⑧

首先是共同命运(Common fate)。在群体动力研究中,共同命运是一个核心概念,^⑨温特亦将共同命运视为集体身份形成的主变量之一,认为共同命运是“他们每个人的生存、健康、幸福取决于整个群体的状况……典型的共同命运是由一个群体面临的外来威胁所造就的”。^⑩如温特所言,外在威胁导致群

体建立了共同命运,在国家面临差异国家带来的威胁时,与相似国之间的命运连接会被调动,加速彼此间的联合,并采取相应手段削弱外在威胁。共同命运是由同一外部力量或同一规则导致的,^⑪外在在威胁外,民族、宗教、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等可以产生同一规则或规范的要素,均可以让两个或多个个体间产生共同命运。可以看到,正是具备制度、文化高度同质性,在冷战期间面对共产主义威胁与自身衰落的现实情况下,欧洲开启了一体化认同的建构。分类阶段带来了同一性的确立,同一性带来的共同命运则使得每一个个体的结局与其他人的结局相关,国家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共同命运的作用下,国家建构着对所属群体的认同。

在群体认同形成后,共同命运依然发挥作用。其与相互依存、国家自我约束共同发挥作用,有助于区域意识从单纯的地理层面的归属意识向更高层次的合作意识和共同体意识演进。^⑫就内群体国家而言,共同命运增强国家对其他内群体国家的友好态度,增强彼此间的友谊;就群体而言,共同命运还起着强化国家对所属群体认同的作用,比如,共同命运带来了欧洲国家对欧盟认可度的提高。^⑬总的来看,共同命运的延续性使得拥有共同命运的内群体国家呈现康德文化下的朋友关系,国家的归属意识会得到巩固,进而提升整个群体的内部凝聚力。相应地,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也会突出,甚至呈现出更强烈的排斥态势。

其次是最佳区分。如果说共同命运为国家间形成认同结成群体带来动力,最佳区分则成为群体排他性与内群体认同走向融合的来源。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玛丽莲·布鲁尔(Marilynn B. Brewer)的最佳区分理论(ODT)指出个体有两种强烈的社会动机:^⑭一种是包容性的需求,即自身能够成为一个团体的成员;另一种是分化性需求,即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在这两种动机假定下,一个排他性的群体远比一个高度包容的群体有更强的吸引力与认同感,因为前者同时满足了两种需求。对受身份政治影响的国家而言,本体安全驱动着国家的包容性需求,区分差异思维驱动着分化性需求,主导或者加入一个排他性群体成为必然。此外,最佳区分也对群体认同产生影

响。当个体两种需求的平衡受到威胁时,个体会通过调动内群体的认同融合去应对威胁。而无论个体哪一种需求得到高度满足,结果都会呈现内群体认同的强化。可以看到,当异质国家的实力与自身实力缩小时,国家的包容性需求与分化性需求的天平出现失衡,该国家往往会借助群体的力量去应对威胁。以美苏为例,之所以出现群体性对立,就在于双方的包容性需求与分化性需求出现了失衡。对美而言,针对欧洲的分化性需求受到侵蚀,希腊共产党从1935年的1.7万人上升到了1945年的7万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从1945年5月的2.8万人上升到了1945年9月的7.5万人,在欧洲的每一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支持率都在攀升。^④为了避免红色遍布欧洲,美国需要通过同一意识形态这一工具凝聚群体内部认同。对苏联而言,出于对德日复苏、垄断资本主义威胁着本体安全,其包容性需求陡然提升,苏联同样需要借助意识形态建立起具备同质性的“安全带”。

(三)诉诸实践:调动认同融合进行的国家间互动

在个体认同走向群体认同的过程中,认同是动态变化的,经历着认同融合阶段。与群体认同不同的是,认同融合是个体发自内心的与群体的合一感,^⑤当群体认同成为个体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就意味着认同融合的发生,^⑥达到所谓的“群体即我,我即群体”状态。在认同融合的过程中,个体对群体产生积极的情感,认为群体是由相似的成员构成的大家庭,每个人对群体具有相似的价值,并抱有共同的目标,所有成员愿意为彼此,为群体共同目标做任何事情。^⑦当个体面对另一个内群体成员受到威胁的情况,会产生共同应对威胁的攻击和防御反应。这是认同融合导致的亲群体行为(pro-group action)在发生作用,亲群体行为指个体为了群体利益或群体内成员展现出亲近互动意愿,是个体做出的有利于所属群体的行为,有温和与极端之分,^⑧其中,群体内部的捐赠、援助、合作等行为为温和亲群体行为,为群体而战、为群体而亡这种则属于极端亲群体行为。国际关系中的亲群体行为有三种运行场景:一是灾害刺激下的亲群体行为,比如,面对海地的地震灾害,瑞典、法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提供灾害

援助;二是外群体威胁下的亲群体行为,在“四国机制”从1.0版本向2.0版本的过程中,美日印澳之所以能实现机制升级、对话扩员与议题扩展的高水平磋商合作,^⑨关键在于遏制中国这一外群体国家的崛起;三是尝试同化甚至主动打击外群体国家的亲群体行为,小布什执政时期提出“大中东倡议”(Greater Middle East Initiative)以维护西方普世价值的姿态对中东国家进行民主改造,再到如今拜登上任以来频频以价值观问题对中东国家开刀,中东地区一直是美国践行身份政治的主阵地,这既是执政党笼络安抚选民、凝聚国家认同的结果,也是美国建构西方自由主义大家庭的“努力”体现。

在认同融合作用下,国家间明确了合作、对立与冲突的互动方式。首先,对内群体国家而言,彼此间更易选择合作式互动。在内群体中,认同融合不仅使国家与群体产生了休戚与共感,还强化了内群体国家间的朋友角色,随着亲群体行为的发生,与其他内群体国家达成合作互助。在国际关系中,认同融合并非自发的,一个群体想要实现认同融合,需要一个引导者,这个引导者由能够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强国担任。一旦这个引导者奉行二元对立思维,那当面对异质实力强国挑战其全球权威时,认同融合便会被调动,成为维护权威的工具,相应地,内群体国家间的合作也会加深。在现行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体系下,美国以自由平等等价值理念拥有很多拥护国,美及其拥护国之间信息交流、合作互助行为容易达成。而在面对中国这一异质强国时,美国及其拥护者之间的抱团倾向也会加强。其次,处于不同群体的国家而言,达成合作与维持合作较难,彼此间更易陷入对立式甚至冲突式互动。

认同融合放大群际国家的差异。经过分类阶段与动机阶段洗礼的群体间差异性根深蒂固的,当国家与群体的合一感出现并逐步加深时,国家以群体身份认知他国时,与外群体国家的差异会被进一步放大。这种被放大的差异很容易使国家出现认知误区,道不同不相为谋,也会影响国家的话语表达,形成自说自话的无效沟通局面。基于放大差异的群际国家互动底色是消极的,国家间想要达成合作需要投入更多成本。在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欧盟

前,俄罗斯与三国间有机会提升合作与互信;而在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欧盟后,与俄罗斯的敌对程度远强于初。出现这种转折的根源之一在于三国加入后对本国欧洲性、民主性认同的强调,逐渐加深的认同融合导致三国不惜重新书写历史,割裂与俄罗斯历史纽带,认同融合带来的去个性化使得波罗的海三国涌现一系列对俄罗斯“民主倒退”的批评以及支持颜色革命的行为。^⑤

而认同高度融合本身就会带来群际国家间的对立与冲突。当面对竞争关系的外群体时,内群体的高度融合会强化敌友认知,而对敌对群体则会表现出更多敌意,^⑥彼此间容易陷入对立冲突状态。同时,在认同高度融合带来的极端亲群体行为下,一个内群体国家面对的威胁会变成整个群体共同面对的威胁,国家为群体做出牺牲是正义的,在群情激愤与为之一战的非理性调动下,两个异质国家间的摩擦矛盾很容易转化为冲突。此外,认同的高度融合加剧了国家的排他性。认同高度融合其实是对上文提到的包容性需求与分化性需求的高度满足,国家已经将群体与自己等同。群体认同的达成原本就是排他的,分化性需求的高度满足意味着以自己为代表的群体对外群体的排斥更强。这种情况下,两个群体中的国家间互动难以摆脱排他性桎梏,通过对立与冲突的互动实现排他性,进而体现自我和群体的合一感。

就身份政治本身而言,其作用有着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作用在于以价值观、情感、文化等为凝聚的“厚的承认”能够建立国家间紧密而牢固的连接,促进国家间合作的开展。比如,中国、俄罗斯都有着大国身份,但双方以平等尊重、守望相助为基,对彼此身份做到有效的尊重与承认,做到相互认可、不搞对抗,成为大国关系的典范。但在无政状态下,权力政治的陈窠实难破除,在等级制下,一些国家长期致力于主体位置的维护或提升,尤其对霸权国而言,在长期的霸权护持进程中,其敌友划分根深蒂固。而当身份政治成为这些国家进行权力竞争的手段时,身份政治发挥着挑起群际国家对立冲突的消极作用。需要进一步反思的是,国家本身就是基于差异区分而形成的集合体,领土空间、民族、信仰和语言

等要素是彰显一国特点的存在,然而,在身份政治作用下,这些要素成为国家类别化判断的根据。随着权力转移的显现,国家间认同的建构与强化加剧了群体间的区分、排斥与对立,身份政治成为国家争权逐利的工具。当国家依循此类逻辑行事时,国家间便显现出互动困境。

三、身份政治作用下的国家间互动困境

从本质上来讲,身份政治的差异属性是客观存在且难以弥合的,这决定了始于差异区分的群体间矛盾和对立难以消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历史上诸多国家间的互动都遵循该理念,这也成了党同伐异的合理性来源。当身份政治成为国家维护自身地位的工具时,则被赋予强烈的主观色彩,放大差异,塑造敌手,偏见与污名化成为重要手段。在本质属性与工具属性的综合发酵下,受身份政治浸染的国家间由态度上的对立走向行动上的对立,出现如下互动困境:

(一)差异、排斥思维塑造的消极互动底色

国家间的认同是一种社会建构,是后期“生产”出来的,它永远不会结束,总是处在过程中,自我是相对于“他者”建构的,^⑦是在源于差异的分类这一看似稳定的基础上建立的。作为一种差异政治,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遵循的差异逻辑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它是实现“自我”合法化的途径,国家依托与“他者”的差异进行着自我实现,将基于自身关照的利益、价值观、规范等进行普遍化,实现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的转变。在“自我”合法化的过程中,会出现与“他者”的区分与一较高低;同时,寻求普遍主义意义的转变并非一家独有,在竞相谋求普遍意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相互比较、指责以突出己身优越。这种“自我”合法化的实现过程为国家间的互动蒙上阴云。在伊斯兰文明的认同建构中,着重强调与西方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的不同,指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相应的经济制度未能为成员提供经济和人身安全;在提供低成本或免费的社会福利服务时,尤为强调世俗政权未能充分提供此类社会服务,^⑧造成人民的痛苦与苦难。通过与世界其他文明、世俗政权差异的强调以及指责,以及对正义、福利和共同体等观念重新释义,伊斯兰文明实现了“自

我”合法化,伴随着群体认同的建构,形成了与世俗政权相对立的团体。然而,不同文明的合法化与普遍化会发生碰撞。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和五角大楼的政治精英们试图寻找一个新的敌人,而以伊斯兰之名攻击美国为帝国主义的国家成为这一寻找的自然候选者。缺乏民主文化和制度,再加上这些国家对人权的粗暴侵犯,促成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③在对民主平等等价值观的优劣划分下,美国进行着自我实现,同时对这些国家的干预与打击也有了正当性。

另一方面,由于过度强调与夸张想象,差异可能转变为某种“我们”对“他者”的排斥甚至暴力,^④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差异成为一种固定陷阱,被永恒化为绝对的、二元对立的。^⑤在“我群”与“他群”的差异划分中,二元对立是一种普遍的分类模式,因为有了与“他群”的区分、对立,“我群”以及群体认同得以建构。而当群体之间秉持着二元对立思想,群体的界限与排斥会被强化。从学理上看,二元对立是秩序的一种表达,在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看来,“肮脏”意味着失序,“洁净”意味着有序,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创设国家而言,以制度、规则进行预防是维持“洁净”秩序的重要手段,而其根本还是在于同化或排除“肮脏”源头,建立“洁净”的同质群体。而当其与那些处于国际秩序非中心位置的异质国家互动时,既缺少尊重又有失公平。从现实政治来看,世界文明结构呈现出“二元结构”,即东方—西方的二元关系,二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发生接触、矛盾、冲撞乃至战争的动态过程。^⑥尤其在西方图景中,二元对立思想影响深远。在城邦向帝国的转变中,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政治家们表现出一种狭隘的以希腊为中心的二元逻辑,希腊人比非希腊人、野蛮人享有特权,将非希腊人、野蛮人、奴隶等群体抹杀,表现出明显的帝国二元逻辑,成为后西西方霸权的思想来源。^⑦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成为身份政治的始作俑者,其以二元对立这种分类模式进行差异区分,排斥中国模式,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刺激下,这种排斥以政治化、污名化的形式显现出来。而在各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拜登政府遵循二元对立的民

主价值观,召开的“民主峰会”成为赤裸的政治秀场,企图通过共同“价值观”的感召力,实现“美式民主”的复兴。

(二)认同之殇、群体之分限制着国家间的互动方式

在身份政治作用下,国家的互动方式被限制。具体而言,第一,深陷国内层次身份政治的国家对外互动方式呈现内敛性与集中性。就内敛性而言,当身份政治造成国内社会分裂、对国内政治带来冲击时,国家往往呈现对外政策的收缩,以求维持国内政治的稳定。这在欧美国家非常常见,由种族、难民诱发的政治抗争撕裂着欧美国家内部的政治认同,外溢至对外政策选择上呈现力量收缩,美国单边主义的回归、英国脱欧成功,这些国际社会现实成为身份政治破坏力的映照。就集中性而言,表现为集中力量渲染、树立国家的外部敌人,以强化国家认同、转移国内矛盾。当国内出现由多元认同群体、国内矛盾激化带来的“裂缝”(Cleavages)时,政府作为合法的意识形态实体塑造政治认同,同时也能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制造对“他者”及其与种族主义亲缘关系的恐惧和仇恨。^⑧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特朗普政府最初对中国的抗疫努力持赞赏态度,但随着美国疫情的爆发,赞赏转化为指责与污蔑,“中国病毒”的说辞屡屡出现。中国成为病毒的源头,这样的污名定论引导着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口诛笔伐,原本已四分五裂的群体认同得以强化。这种情境下激发的国家间的身份政治其实更像是一种强制性的补救措施,集中性树立敌人的补救措施也损害着国家之间的信任,国家之间互动的不确定随之增强。

第二,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之争造成国家间互动缺乏稳定性与延续性。国家间互动走向深入与和谐本身就是一个难题,作为一个博弈过程,国家间互动兼具稳定性与动态性,而认同发挥着纽带维系的作用,为原有的成本收益考量增加一重延续保障。当国家间出现由价值观、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认同缺失时,身份政治无疑成为彼此互动走向稳定延续的一大阻力,对不同群体的国家而言,达成合作式互动的不确定性随之增强。以中美两国为例,自20世纪70年代中美之间跨越意识形态的障碍走向正常化

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摩擦冲突断断续续地影响着两国合作的开展。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以人权之名对中国进行批评反对,甚至于1993-1994年间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状况挂钩,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摩擦逐渐突显,中美战略合作受阻。^④而2017年后,中美意识形态之争再度兴盛,在特朗普政府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来自竞争对手对民主的诋毁以及野蛮意识形态的散布成为美国的核心关切,中国成为美国口中的“邪恶国家”与“修正主义国家”,中美之间战略竞争凸显。拜登政府的上台将中美之间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摩擦矛盾推向高潮,在美国“民主国家联盟”构想下、G7康沃尔峰会、北约峰会与“全球民主峰会”先后召开,推动对华意识形态竞争持续演进,大大压缩了中美之间的合作空间,目前来看,中美之间唯一可能的重要合作领域是应对气候变化,^⑤但受两国总体竞争的影响踽踽独行,成效甚微。随着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中美两国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及国家发展模式间的差异碰撞是难以避免的,但持续或明确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之争会大大增加两国间对立冲突发生的概率。

第三,群际互动模式制约着国家间合作式、自主式的互动。身份政治最终是一幅群际互动图景,每个群体是根据外来者、非团体成员进行定义的,其他身份、其他群体的存在成为一个群体存在的合理理由,为了有效建构认同加强群体团结,他群就被定义为低等的、潜在的敌人、不合时宜的或需要规训的对象。^⑥当国家以某一身份、某种认同为口号逐渐向群体、阵营演变时,就跌入了身份政治的陷阱,极端亲群体行为下的“唯阵营论”、异质群体之间的“对立冲突注定论”,这些论调使国家间互动方式受限,处于不同群体的异质国家合作的空间与可能性被压缩。而拥有某一群体身份也会使得国家做出互动选择的自主性下降,呈现对中心位置国家互动的从属性。在冷战期间,两个意识形态阵营都倾向于通过简单的二元对立来形象化国际关系,从而形象化世界政治,在二元对立叙事、意识形态异质及制度异质的氛围下,以美苏为中心的群际互动呈现着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军事领域竞赛甚至局部热战冲突,分属于两

大阵营的国家间的自主性选择空间被压缩,互动方式也从属于阵营之间的对抗。同样,面对拜登政府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政治现实,日本依然延续弱化自主性的追随战略,在对华政策上追随美国,拥护建立以民主、自由、人权等共同价值观为基的盟友体系,助力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政策。

(三)权力政治笼罩下黯淡的互动前景

当霸权国权力优势面临下滑甚至丧失时,往往会通过树立共同威胁、调动群体认同的手段,利用“聚旗效应”对异质崛起国合围施压,这是身份政治的现实写照。作为权力政治的一种补充,现行的身份政治未能超越传统权力政治的框架。受权力政治的笼罩,国家间持续强化的敌友观、螺旋上升的敌意以及国家所属群体间对抗的必然性共同造就了国家间互动的黯淡前景。

首先,国家之间持续巩固强化的敌友观。敌友观在政治中是一个古老且根本的话题,在自然状态下,敌友的划分是关乎生存的关键,甚至在施密特看来,政治的标准就是敌友划分。敌友观对权力政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不仅是国家寻求权力累积的方式,也是国家树立权力合法性的手段。同时,由于缺乏有力的规范与协调,敌友的划分成为一种简化的思维框架,有益于国家团结己方、明确与敌对方界限的作用。敌友观的重要性使其强化有着合理性与必然性,而伴随着国家间权力转移的发生,国家间敌友观也会被持续巩固,若国家将来以根深蒂固的敌友观来建构认同、开展互动时,国家间互动方式也会被固化。这点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敌对中可以看出,从冷战时期的苏联到在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内崛起的中国,面对即将或已经发生的权力转移,美国一直以巩固强化共产主义国家的敌人形象为手段维持着自身的中心位置。

其次,权力的不对称性本身会诱发国家间螺旋上升的敌意。国家间权力的不对称性普遍存在,对权力不对称的各方而言,承认、安全和认同的需求有着不同的含义,它们源自截然不同的群体经验以及和其他异质群体的关系。^⑦因此,常态化或稳定化的不对称互动是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⑧然而,由于奉行二元对立思维与国家间强化的敌友观,处于权力

结构中心位置的美国往往难以尊重不同国家对承认、安全和认同的需求,这就使得其经常与异质国家间走向波动性、敌对性的非常态化的不对称互动。同时,权力的不对称性也会导致国家间的错误感知,小国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双边互动上,而大国则在其他重要问题上过度投入,缺乏时间和精力关注与小国的关系,小国的“过度关注”与强国的“疏忽”带来彼此的错误感知,且这种不对称的错误感知是系统性的。^⑧这意味着,只要权力不对称性存在,这种系统性的不对称错误感知就难以消除。而伴随着错误感知的强化,国家之间的误读与误判也会持续加剧。因此,一旦国家陷入与异质国家或异质群体对抗的情境,将很难摆脱螺旋上升敌意的桎梏。

再次,异质群体发生对抗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仅建立在前文所述的身份政治逻辑上,权力政治本身也增强着国家间的对抗。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全神贯注于权力和安全,容易发生冲突,^⑨国际法、国际机制、国际惯例等虽然对国家间关系有一定规范制约作用,降低了冲突、战争发生的频率,但不能遏制权力斗争的发生。在权力斗争中,秉持增加自己的权力或者防止敌对国权力增加的目标,国家往往进行联盟,^⑩围绕政治安全、意识形态等结成群体。这个过程的逻辑起点就是通过维持或增强自身权力以应对既有的威胁,这决定了敌对、对抗思维存在的先验性。在不同性质的联盟中,那些具备意识形态性质色彩的盟约离不开意识形态的相似性,在这样的联盟中,身份政治既是前因也是手段,诸如1815年的《神圣同盟条约》、1914年的《大西洋宪章》及1945年的《阿拉伯联盟条约》,结盟国之间基于意识形态的相似性形成了对彼此具备可靠性的认知,在联盟这一群体内部建构了认同,对外群体表现出团结一致的对敌态度。而以政治安全为目标的联盟也会以认同为手段,例如,“五眼联盟”在炒作技术安全的同时,不间断地指涉、炒作、操弄香港、新疆问题,通过意识形态对立建构、强化着群体内部认同。

结语

作为社会学、政治学交叉概念的身份政治是洞悉当代政治现象的独特视角,相较于国内层次身份

政治研究的深入,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尚有很大空间。本文以推进国际关系里身份政治的理论化研究为目标,对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的内涵、运行逻辑与影响进行探究。

在对身份政治的跨层次分析中,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有着不同的逻辑起点与逻辑条件。国内层次的政治以人为主体,是处于特定位置(边缘/主流)的人以相似性建构认同结成群体以寻求承认与公平的政治实践,其中介是一场场具备政治抗争意味的政治行动,最后的逻辑终点是为了回到应有/原有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是存在公共的政府权威的,因此国内层次的身份政治是在统一框架之下的分散化、碎片化实践,具备一定的可控性,同时政府的调控能力影响着身份政治消极效应与积极效应的发挥。身份政治的破坏力十分显著,具体体现在为政党竞争提供抓手、为政治认同带来分裂以及加剧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性。

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则以国家为主体,是权力政治的补充,遵循着无政府状态的逻辑条件。国家特有的起源与目标决定着国际关系中身份政治的原生性以及非中心国家应对身份政治冲击的被动性。处于特定位置的国家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以是否同质进行着群体分类,其中介是国家之间的合作、对立与冲突的互动方式选择,通过博弈式的互动最终达到利益的累积。无政府状态的存续使得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有着更强的烈度与破坏力,也使其无法超越权力政治的窠臼。作为权力政治的一种补充,权力强弱决定了国家中心到边缘的主体位置划分,不同于国内少数边缘群体对应有位置的争取,弱国发动身份政治实现中心位置的谋求是极其困难的。身份政治通常成为中心国家维护权力优势的手段,以调动强化群体认同的方式压制异质国家的崛起。同时,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有着独特的运行逻辑,受身份政治影响的国家经历着明确分类、动机建构和认同融合三个主要阶段,最终以群体的形式与异质国家开展互动。这种向群际互动的转变是身份政治的核心所在,却也是身份政治广受诟病的原因所在。在国家建构认同走向群体的过程中,二元对立的差异区分造就了国家消极的互动底色,群体身份也限

制着国家进行互动选择的自主性,同时由于权力政治的影响,国家之间的敌友观更加固化,在敌意螺旋上升过程中结成的群体必然是对抗性的。

那么,是否每个国家都难以逃脱陷入身份政治陷阱的结局呢?中国或许是一个否定式的答案。中国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是孕育身份政治的沃土,当代中国坚持的是辩证的“共同体思维”,这种基于相互尊重、协商合作,实现共存共赢共享价值目标的思维方式是避免中国陷入二元对立式、群体对抗式身份政治陷阱的关键。在角色身份上,中国始终坚持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走向权力结构的中心不是中国矢志不渝的追求,以认同为手段进行权力斗争也并非中国的基本遵循。中国这一“反例”的存在是对身份政治适用于每个国家的有力回击。从本质上来看,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其受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的双重建构,究竟什么是国家发起身份政治的根本诱因?亟待未来的身份政治研究对此进行回答。另外,国内层次的身份政治与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又遵循怎样的传导机制,国内层次的身份政治是如何外溢为国际层次的身份政治的,这是未来身份政治理论化研究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审读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章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在现有的身份政治研究中,多数学者将身份政治与认同政治等同,也有少数学者将两者进行区分,认为“identity”被译为“身份”时是一个名词,身份政治便成为围绕主体特定身份而展开讨论的名词;当“identity”被译为“认同”时则是一个动词,认同政治被视为侧重过程描述的动态词汇。本文所探讨的身份政治与认同政治等同,因为身份之所以形成,无法离开认同的建构,当探讨主体的某种身份时,最终要归于对认同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身份政治既有静态的描述性,也有动态的过程性。

②Bruno Latour, et al., "Anthropologists Are Talking—About Capitalism, Ecology, and Apocalypse," *Ethnos*, Vol. 83, No. 3,

2018, pp. 587–606.

③武桐雨:《身份政治:伊朗阿塞拜疆人的身份重构与伊朗的周边外交》,《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3期,第137页。

④N. A. Kabir, "Identity Politics in India: Gujarat and Delhi Riots,"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40, No. 3, 2020, pp. 395–409; N. Ali Nadiya,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44, No. 3, 2021, pp. 451–452; Made Yaya Sawitri, eds., "On the Brink of Post-Democracy: Indonesia's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Post-Truth Era," *Politička misao*, Vol. 58, No. 2, 2021, pp. 141–159; Simon Schlegel, "Identity Politics As Pretext And Prediction: Vote-Buying and Group Boundaries in Ukraine," *Demokratizatsiya*, Vol. 29, No. 2, 2021, pp. 113–133; R. M. Smith,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End of the Reagan Era. Politics," *Groups and Identities*, Vol. 1, No. 1, 2013, pp. 120–127.

⑤李捷:《极端主义组织与认同政治的建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83–105页;林红:《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浪潮中的白人身份政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第56–65页; Verkaaik O., "Violence and Ethnic Identity Politics in Karachi and Hyderabad,"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Vol. 39, No. 4, 2016, pp. 841–854.

⑥孔寒冰:《认同政治的挑战:中东欧在民族关系、国家建构和区域整合中的困境》,《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2期,第9–31页; T. Agarin, "The (not so) Surprising Longevity of Identity Politics: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of The State–Society Compact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20, pp. 1–20.

⑦葛汉文:《“熊通困境”:国际体系中的身份政治与安全两难》,《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6期,第86–104页;张一飞:《国际政治中“霍布斯—基欧汉”区间的衰落与身份政治的兴起》,《当代亚太》2020年第6期,第41–75页。

⑧G. W. Shin, "Identity Politics and Policy Disputes in U. S.–Korea Rel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7, No. 2, 2012, pp. 289–310; Brustad Sam and Kim Ji Young, "Identity Politics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Relations: Understanding the Foundation of Australia–Japan Versus Japan–South Korea Defenc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7, No. 4, 2020, pp. 663–683.

⑨如杰弗里·威克斯认为,认同即你和一些人有何共同指出以及你和他者有何区别之处,从本质上讲,认同给人一种存

在感,它涉及个体的社会关系,包含你和他者的复杂牵连,参见 Jeffrey Weeks, "The Value of Difference," in Jonathan Rutherfor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Ishart Press, 1998; 詹金斯·理查德认为,认同的过程就是追求与他人相似或者与他人相区别的过程,参见 Jenkins Richard, *Soci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6。

⑩这里的群体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组成的,他们自己或者他人认为的社会实体。群体成员之间彼此互动,心理上意识到彼此的存在。由于情感、利益、价值观等相似性塑造着主体间的同质性,成为群体结成的支撑,而同质主体结成群体之后,共享内群体成员的身份,与异质的外群体形成鲜明对比。但需要注意的是,对国家而言,由于权力政治的影响,并非所有同质国家都能结成群体,同质国家间群体的结成还要存在共同的威胁。

⑪[英]布鲁克斯:《组织行为学:个体、群体和组织》,李永瑞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

⑫ Jonathan Hill and Thomas Wilson,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ies," *Identities*, Vol. 10, No. 1, 2003, pp. 1-8.

⑬差异与同一表面是相反的概念,在后现代理论中,差异政治以差异实现着主体自我的合法性与对平等的追求,身份政治却以同一为核心实现着对主体位置的追寻,差异政治看似与身份政治是截然对立的。例如,利奥塔认为,差异意味着绝对平等,相应地,集体认同是不可建立,这种极端的多元主义将差异与认同割裂对立。实质上,同一的达成是在与他者的差异区分上实现的,差异既是同一达成的底色,也是同一不断强化的一种根源。因此,身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差异政治,但差异政治的内涵与范围均比身份政治宽泛。

⑭韩震:《国家认同:想象的共同体,还是基于历史进程的民族构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1日,第6版。

⑮周宪:《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页。

⑯汪越:《身份政治的理论逻辑》,《学术界》2018年第3期,第93页。

⑰王帆:《论观念差异与国际合作:“合异论”的提出》,《国际观察》2020年第3期,第7页。

⑱认同是社会的产物,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在主体上有根本不同,国内社会的主体是公民和国家,国际社会的主体是国家与国家间组织。同时,一定的政治生活是政治主体活动的过程,这里的主体既有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等,又有作为个体存在的公民。参见徐恕:《国内社会、国际社会、人权

与主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第78-80页;方旭光:《政治认同的逻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

⑲ Thomas Heine Nielsen, "Triphylia: An Experiment in Ethnic Construction and Political Organisation," in Thomas Heine Nielsen, ed., *Yet More Studies in the Ancient Greek Polis*, Stuttgart: Steine, 1999, pp. 129-162.

⑳ G. W. F. Hegel,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Being Part Three of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William Walla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p. 170-174.

㉑ Tony Burns, "Hegel,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Problem of Slavery," *Culture, Theory and Critique*, Vol. 47, No. 1, 2006, pp. 87-104.

㉒ Carl Pletsch, "Class,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Politics," *Peace Review*, Vol. 11, No. 2, 1999, pp. 197-202.

㉓需要说明的是,在身份政治中,人与国家不是割裂的,尤其在国内外层次的外溢中,由人发起的跨境性的群体运动(如跨国宗教或政治运动)常被国家镇压,之所以如此,是由国家对内统治决定的,在面临一定的认同危机时,为了维持统治,国家会以可支配的强制性权力镇压或者消除相应运动。而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有独立自主权,其本身的一身二任决定着国家在身份政治中的复杂角色。

㉔ Alexander Wendt, "The State as Pers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2, 2004, pp. 289-316.

㉕ 尚会鹏:《“个人”“个国”与现代国际秩序:心理文化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44页。

㉖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8页。

㉗ 同上。

㉘ 王缉思:《文明冲突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载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

㉙ 对于国家位置的划分,学界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基本共识,如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依据地缘空间划分的中心—边缘结构,世界体系理论依据生产关系划分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参见[美]索尔·伯纳德·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Inter-State Structure of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n Steve Smith, et al.,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

tivism and Beyo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87-107.

⑩ Deepa M. Ollapally and Alexander Cooley,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2, No. 4, 1996, pp. 479-499.

⑪ Helen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1, 1991, pp. 67-85.

⑫ Andrew Davenport, "Multiplicity: Anarchy in The Mirror of Sociology," *Globalizations*, Vol. 17, Issue 3, 2020, pp. 532-545.

⑬ Ahsan I. Butt, "Anarch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amining South America's War-Prone Decade, 1932-4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7, No. 3, 2013, pp. 575-607.

⑭ [美] 玛丽莲·布鲁尔:《我们,你们,他们:群际关系心理学揭秘》,李卫华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6-49页。

⑮ 陈高华:《行动、叙事与认同:从阿伦特到利科》,《哲学分析》2021年第1期,第133页。

⑯ Claude Levi Strauss, *From Honey to Ashes: Introduction to a Science of Myth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p. 2.

⑰ Jutta Weldes,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Crisis: U. S. Identity and Missiles in Cuba," *Cultures of Insecurity: States, Communit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Danger*, MN: University of, 1999, p. 11.

⑱ Gandalf Nicolas, et al., "Mind the Overlap in Multiple Categorization: A Review of Crossed Categorization, Intersectionality, And Multiracial Perception,"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Vol. 20, No. 5, 2017, pp. 621-631.

⑲ J. F. Dovidio and S. L. Gaertner, "Intergroup Bias," in S. T. Fiske, et al.,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Wiley, 2010, pp. 1084-1121.

⑳ J. C. Turner and K. J. Reynolds, "The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 in Intergroup Relations: Theories, Themes, And Controversies," in Rupert Brown and Samuel L. Gaertner, *Blackwell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Intergroup Processe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 pp. 133-152.

㉑ 最佳区分意即群体成员与非成员边界的清晰明确区分,最佳区分与区分不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区分可以依托外在特征达成,但最佳区分更多是在主体关于自我意义与自我需求的基础上阐发的。在最佳区分作用下,主体建构某一群

体认同代表着其自我意义与自我需求的有效实现。在主体对内在自我的坚持下,组成的群体彰显着自我所属类别的突出性与自我所属群体身份的排他性。

㉒ D. T. Campbell, "Common Fate, Similarity and Other Indices of The Status of Aggregates of Persons as Social Entities," *Behavioral Science*, Vol. 3, No. 1, 2007, pp. 14-25; Jane Sell and Tony P. Love, "Common Fate, Crisis, And Cooperation in Social Dilemmas," in S. R. Thye and E. J. Lawler, *Altruism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Groups*, 2009, pp. 53-79.

㉓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9页。

㉔ Marilyn B. Brewer, "Superordinate Goals Versus Superordinate Identity as Bases of Intergroup Cooperation," in Dora Capozza and Rupert Brown, *Social Identity Processes: Trend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2000, pp. 117-132.

㉕ 张度:《比较视角下的东北亚区域意识:共同命运对集体认同的关键影响》,《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116页。

㉖ M. J. Hornsey, et al., "Dragging Down and Dragging Up: How Relative Group Status Affects Responses to Common Fate,"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Vol. 7, No. 4, 2003, pp. 275-288.

㉗ 在布鲁尔看来,达成群体认同可以被视为同化和与“他者”区别的妥协,即去个性化在群体内被满足,同时通过群体间的比较满足自我独特性。对主体而言,高度个性化容易带来孤立和污名化,完全的去个性化又不能提供比较评价与自我定义的基础。因此,主体产生某一群体认同的动机,即为了自身安全选择成为某一群体成员,即包容性需求,通过自身被吸纳进大的团体来满足;同时又凭借该群体身份与“他者”区分,建构自我个性,即分化性需求,通过区分自身与其他人来满足。参见 Marilyn B. Brewer, "The Social Self: On Being the Same and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17, No. 5, 1991, pp. 475-482.

㉘ Adam Westoby, *Communism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81, pp. 14-15.

㉙ William B. Swann, et al., "Identity Fusion the Interplay of Personal and Social Identities in Extreme Group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96, No. 5, 2009, pp. 995-1011.

㉚ William B. Swann, et al., "When Group Membership Gets Personal: A Theory of Identity Fus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119, No. 3, 2012, pp. 441-456.

⑤1 崔丽娟等:《家庭认同和认同融合对极端家庭行为的影响及其中介变量的研究》,《心理研究》2013年第3期,第69页。

⑤2 杨通平、陈国典:《认同融合:观点及作用机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年第5期,第1056页。

⑤3 曹鹏鹏、石斌:《“印太”视域下“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及其限度》,《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0期,第45-46页。

⑤4 梁强:《“身份认同”与“安全两难”:加入北约和欧盟后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3期,第77-80页。

⑤5 Martha Newson, et al., "Brazil's Football Warriors: Social Bonding and Inter-Group Violenc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Vol. 39, No. 6, 2018, pp. 675-683.

⑤6 S.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 pp. 222-237.

⑤7 Deepa M. Ollapally and Alexander Cooley,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2, No. 4, 1996, pp. 479-499.

⑤8 W. Said Edward, "The Clash of Definitions," in Emran Qureshi and Michael A. Sells, *The New Crusades Constructing the Muslim Enemy*, West Sussex: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68-87.

⑤9 周宪:《认同建构的宽容差异逻辑》,《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第132页。

⑥0 Heike Becker,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Southern Africa Special Issue on 'Engaging Difference: Perspectives on Belonging and Exclusion in Contemporary Southern and East Africa'," *Anthropology Southern Africa*, Vol. 33, 2010, pp. 75-80.

⑥1 叶隽:《二元对立的文明冲突与可能的第三维:被“伊斯兰国”恐袭改变的世界秩序》,《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第134页。

⑥2 Dietz Mary, "Between Polis and Empire: Aristotle's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6, No. 2, 2012, pp. 275-293; V. Spanos William, *America's Shadow: An Anatomy of Empi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 75.

⑥3 Ranjan Bandyopadhyay, "Resistant Hybridity": Identity Politics of The Naga Indigenous People in India," *Identities*, Vol. 128, 2021, pp. 399-417.

⑥4 节大磊:《意识形态与中美战略竞争》,《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88-97页。

⑥5 时殷弘:《拜登政府对华态势考察:非战略军事阵线》,《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6期,第23页。

⑥6 Eriksen Thomas Hylland, "We and Us: Two Modes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2, No. 4, 1995, pp. 427-436.

⑥7 N. N. Rouhana, "Group Identity and Power Asymmetry in Reconciliation Processes: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ase,"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Vol. 10, No. 1, 2004, pp. 33-52.

⑥8 Brantly Womack, *Asymmet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2-39.

⑥9 Brantly Womack, "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 China, Vietnam and Cambodia during the 1970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6, No. 2, 2003, pp. 92-119.

⑦0 Duncan S. A. Bell, "Anarchy, Power and Death: Contemporary Political Realism as Ideology,"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7, No. 2, 2002, pp. 221-239;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1988, pp. 485-507.

⑦1 需要指出的是,身份政治与联盟政治有所不同,国家间相似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感情亲近度等带来的认同是身份政治的充分必要条件。但联盟政治是以战略利益、国内秩序兼容性、实力关系等多种要素为支撑的,其中,围绕相似价值观及意识形态、感情亲近度等带来的认同只是国内秩序兼容性的表现之一,国家间能够就意识形态、价值观等相似性建立认同结成或维系联盟,但其并不是联盟政治的充分必要条件。国家间认同的建构是国家走向联盟的重要参考,也是在联盟建立与维持的过程中的重要手段。

⑦2 贾中海、程睿:《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方式:特质、生成逻辑与内生机制》,《理论探讨》2021年第2期,第43-44页。